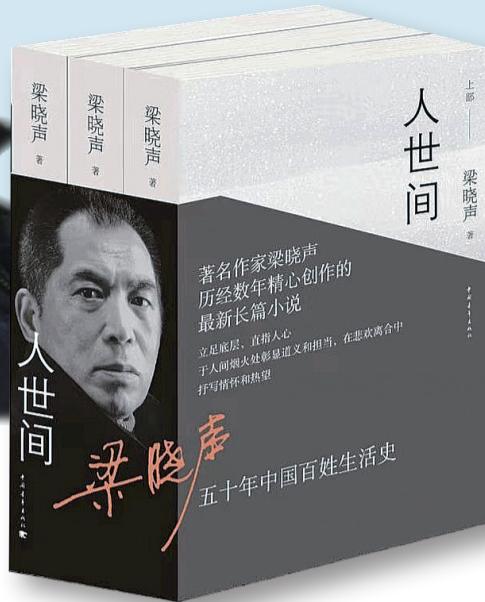


梁晓声《人世间》:

凸显人性正能量的价值

□本报记者 行 超



记 者:从上世纪80年代的《今夜有暴风雨》开始,梁晓声的写作持续了近40年。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梁晓声以及以他为代表的一代作家的写作中,具有怎样特别的价值?

孟繁华: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梁晓声一直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核心作家之一,也是知青文学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一直秉持的理想主义精神和情怀,使他的作品有极高的辨识度,从而在文学界和读者那里有深远且广泛的影响。他的《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雨》《雪城》《年轮》等小说,应该是这40年来文学的核心读物的一部分。《人世间》与上述提到的作品完全不同。它规模巨大,皇皇三大卷,115万字。小说以周氏三兄妹的人生经历为主线,写出了城市平民近50年来生活的巨大变迁。这一规模从一个方面表达了梁晓声超强的叙事能力和耐心。

刘大先:在一般当代文学史的认知中,梁晓声以知青题材小说闻名,《人世间》的主要人物其实仍然是知青一代人。某种意义上说,这部作品可以视作是对自身人生史的总结,而个体的生命遭遇无疑与时代、社会的转型脱离不了联系,所以也是一部具体而微的当代史,当然它主要侧重于“东北一城市—平民—工人”的故事。

刘 琼:一个真正的作家,他的创作是大的而不是小的,是历史的而不是短浅的,他的文字为历史负责,为时代塑形,为他挚爱的人民代言。40年来,从知青题材到描写北方沧桑巨变的皇皇巨著《人世间》,梁晓声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掷地有声、抓铁留痕,诚实地、艺术地、深情地书写历史和时代。其中,《人世间》是梁晓声倾注心力最多也是最重要的作品,是近年来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是完全可以流传后世的作品。小说的平民视角、史诗品格、现实主义精神,描写中国社会发展的光荣与梦想,也反映改革开放进程的艰难和复杂,充分揭示了历史的本质,表达了一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家国意识和人文情怀。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的价值将越来越显现。

记 者:在《人世间》的写作中,梁晓声始终秉持着一种质朴平实的现实主义写作态度。您认为,现实主义写作在当下具有怎样的力量和意义?

孟繁华:小说将人性的善、人心的单纯刻画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让我惊讶、震动、喜欢。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文学青年的阅读圣经和励志经典,写的可以说是英雄;《人世间》写的是百姓生活,它将励志色彩潜隐在作品当中,写人物、写人心,对当下青年读者具有教科书意义。同时,《人世间》不是以人物情节大开大阖、跌宕起伏取胜,它像一条小溪,缓慢地沁入我们的心田,让读者看到近半个世纪间中国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我们感受到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的巨变。

刘大先:如果我们将写作理解为应对现实的一种方式,那么“现实主义写作”并不是某种固定的教条,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因而现代主义手法也可以视作“无边的现实主义”的一种。梁晓声的写法确实属于比较典范的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方式,是对外部现实的模仿,塑造出那种让人感觉可亲可感的社会氛围、人物形象,具有某种认知价值,让读者产生同情共感式的理解。这种写法在梁晓声本人那里是以贯之的,但如果我们回眸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思潮的变化,尤其是经过“朦胧诗”、“先锋小说”、反讽解构式叙事的当代文学发展来看,这种写法就显示出其正大的气象,是一种回归,它可能不够时髦、不能为前沿的批评家提供形式上的刺激、意义上的启迪,但并没有“过时”或者失

效,尤其是对于更多的普通读者来说,它依然具有打动人心的生命力。

刘 琼:丰富、复杂、变化、鲜活的时代经验,需要及时、准确、艺术、有效的文学处理。《人世间》是作家梁晓声的人生经历、思想储备和文学经验的一次全方位的调动,充分彰显了现实主义写作回应时代生活的力量。看《人世间》,也是我本人迄今为止对于当代文学最激动、最享受的一次阅读体验。可以说,《人世间》对于现实的书写,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是历史的而不是片段的,是生动的而不是概念的,是新鲜的而不是陈旧的,是文学的而不是其他的,是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它极大地继承和发扬了俄苏文学的写作精神,是科学的历史观、浪漫的人文精神和出色的文学表达的三结合。《人世间》的感染力,说明真正的现实主义既不老也不过时,它是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最好的寓所。我们对于现实主义写作各种各样的误解,导致我们丢失了有效的、珍贵的甚至是高贵的文学初心。重张现实主义,也是重建写作与时代、历史和生活的素朴而亲密的关系,重树现实主义写作的尊严和意义。

记 者:很多年来,我们的文学似乎习惯了“中立”、“零度”,梁晓声的《人世间》却体现出作家鲜明的价值立场和悲悯情怀。您怎么看待这种写作态度?

孟繁华:《人世间》是一部近半个世纪中国城市平民的生活史,是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史,是底层青年不懈奋斗的成长史,也是一部书写“好人文化”的向善史。小说强烈的人文关怀和平民意识,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梁晓声始终强调文学要反复不断建立人性正能量的价值。他说,“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我有时也会困惑,人类社会究竟要走向何方?但我始终认为,人类作为地球上的高级物种,让自己进化为最有善性的一个物种,才是终极方向。文学应该具备引人向善的力量,能影响一个人成为好人。”在《人世间》中,作家的基本诉求是通过平民立场讲述“好人文化”,这是作家深切的情怀和热望。

刘大先:“价值中立”其实也是一种价值,“零度写作”也是一种“度”,这些提法有其具体语境和对应的对象,并不具备普遍性,也无法成为通行的教条,只是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出于对此前宏大叙事末流中的虚情假意的不满,在许多作家那里又因为接受了现代主义的一些理念,所以在许多写作者那里一度流行这种风格。但归根结底,修辞立其诚,即便是加缪的“局外人”的疏离,那也是一种有“诚”的情感。我觉

得,《人世间》中所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的悲悯有着深沉动人的力量。

刘 琼:梁晓声写作中的这种价值立场和悲悯情怀,是梁晓声作为一个作家最值得尊敬之处。文学是精神劳动,文学怎么可能“中立”、“零度”?文学不仅不可能“中立”、“零度”,真正伟大的文学,一定是积极地有态度地介入生活,文学的触角一定是敏锐地、勇敢地、有效地深入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世间》的深入空间是东北某个城市某个角落的平民区,通过对这个地方从形成到消失和被改造的漫长历史的展示,记录时代变化下的人们的生活乃至命运的变迁,探讨他们的苦乐悲欢以及背后的原因,探讨社会各阶层主要是社会底层和社会基层的构成,包括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文化的提升作用,它充分地发挥了文学介入生活的功能,提出了许多真问题,并通过生活自身来解决、解答它,而不是发牢骚。《人世间》这种建设性的有态度的写作,是有情有义有见有识的写作,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社会进步的写作。这种写作态度,是太高级了,而不是太落后了;是太难得了,而不是太多了。

记 者:《人世间》的写作从上世纪70年代一直写到今天,时间跨度长达50年,涉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您认为,这部小说向读者呈现了怎样的时代变迁与时代现实?

孟繁华:梁晓声说,我写作这么多年,一直认为文学是时代的镜子,作家是时代文学的书记员。《人世间》从1972年写起,以周家两代人的生活及其变迁作为核心内容,这是一部通过周氏一家反映社会历史变迁的小说,也是周家儿女和他们那一代人几十年成长的小说。其中先后写到了知青插队、三线建设、工农兵大学生、知青返城、恢复高考、国企改革、“下海”、职工下岗、棚户区改造,一直写到今天,小说虽然写的是平民百姓的生活,但时代的大环境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背景。时代性在个人性格中仍可以见微知著。

刘大先:《人世间》几乎囊括了上世纪70年代到当下中国关乎时代变迁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但是它并不是将外部社会机械地穿插、叠加在故事情节之上,而是将之内化在人物命运及其情感与精神世界之中,通过人的感觉方式的变化呈现出社会生活总体性的变化。

刘 琼:小说以真实细腻的笔触,讲述中国社会近50年来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巨大变迁,展现各个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和希望。对于历史的本质性、整体性、丰满性、复杂性,都有清醒的科学的扎实描述。历史的真实不仅准确

形象地呈现在文字里,而且提供了闻所未闻的可信赖的经验。大历史的书写形象有机地体现在小历史的描述中,使小历史的交代真实、可信、有动力。

记 者:《人世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在我们当下的文学写作中有什么特别之处?

孟繁华:小说中的人物都是非常普通的平民,但是每个人身上都具有可贵的善良,是精神世界中非常高尚的人。小说中周家人出现的时候,只有周秉昆和他的老母亲两个人,父亲周志刚在贵州,其他孩子下乡,20岁的周秉昆待业在家。就是母子两人,家里也不得安宁,姐姐与诗人冯化成的恋爱让母亲愁肠百结寝食难安。另一方面,那个年代的物质生活异常艰难,即便如此,人心还是善的。蔡晓光是一个普通人,他非常喜欢也深爱着周蓉,但周蓉已经名花有主。他为了不让其他青年骚扰周蓉,便枉担虚名仍然假做周蓉的男友。这些细节并不惊天动地,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却从一个方面表达了那个年代普通人的善良和朴素。

刘大先:《人世间》不是极端的故事、耸人听闻的惊谈或者聚焦于人性阴暗、卑琐、恶劣面的“批判”,它写的是通常意义上的“好人”,他们的感情、见识、道德是一般人的水准,他们的遭遇也很少惊心动魄、曲折离奇的大起大落,他们经历了绝大多数普通人都会经历的生活变迁,因而这个小说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典型”意味:在具体的人物中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它与《平凡的世界》挺像,虽然两者涉及的历史阶段不太一样,路遥以农民为中心,梁晓声以工人为中心,但是没有人怀疑他们写的是转型时代里的中国人,是我们的祖辈、父辈和同代人。

刘 琼:《人世间》写出了一系列层次分明、鲜明独特的典型人物,这些人物让人读完受益,这是作品具有很强感染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人的命运最动人。能提供站得住、留得下、传得开的人物形象的小说,才是可以流传的小说。《人世间》里的人,是从时代生活走出来的血肉丰满的人,是具体历史环境里的人,他们身上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时代激情,他们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基本力量。《人世间》写出了人民性,人民性是形象的、艺术的、可触摸的。小说既有叙事和描摹,又有对话和探索,写出了平凡世界里可信的人,也写出了精英世界里可敬的人,写出了人生的光辉和理想向度。周秉昆、周秉义兄弟因此成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里鲜明生动的这两个。

徐怀中《牵风记》:

雄浑与奇幻相结合的奇峰

□本报记者 丛子钰

记 者:您怎么评价《牵风记》的艺术价值?在题材和写法上,小说的个性体现在哪里?

朱向前:汪可逾作为全书的中心,作家心中的女神,八字以蔽之:纯净如水,冰清玉洁。她毫无心机的单纯与善良,可说原本与战争格格不入,在当代战争文学中也几无先例。尤其是小说的后半截,从汪可逾内心藐视齐竞开始,突出了她的神圣不可侵犯。直至与曹水儿双双孤身转战大别山区而曹对其视若神明,丝毫不敢亵渎。再到最后在大溶洞中的坐化式离世和肉身不腐,“滩枣”将其驮出深洞送到千年银杏树下又呈站姿向前态,可谓愈来愈奇,不能以常理喻。初读之下,难免有一些困惑。而且,据我所知,包括其他文友、论者、编者,有此困惑者还不在少数。但是大凡因此而与先生讨论者,先生均以笑而不语回应之。或曰:此间确实包含了我对战争与人生的一些领悟,你能看出三分就三分,你能看出五分就五分,我决不做更多的解释与说明,当然也不因此擅改之。没有做好是我的问题,请大家多包涵……何等笃定,又何等淡然。我认为其中主旨之一就是寓意了美对战争的超越,美体现于汪可逾这个人,更寄寓于那张琴,就像作者最为推崇的原音一样,来自远古,传向未来。怎么才能让美真正超拔起来?作者在接受访谈时反复强调,要做减法,要溯源而上,回到三江源头,回到中国最古老的叙事传统。

中国文学塑造女性、赞美女神是一个传统主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此相辅相成的传统境界,即无巧不成书,无奇不成典——书是说书,故事也;典是经典,传奇也。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徐怀中的美学理想:写战争中的人性、爱情和美,但人性、爱情和美又是最重要的、最高的,可以超越战争,甚至可以超越时空。我想起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也是千年以返,人们都能接受而且喜欢那些传奇的重要原因。徐怀中的写作正是向中国

小说叙事传统的回望与致敬,同时又是一种走向高峰、创造奇峰的写作。

李国平:从思想上说,《牵风记》展现出雄关漫道、砥砺前行、浴火重生的精神气质,其中突出对比大我与小我、人生理想与民族梦想,写出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与历史的合法性结果,同时又写出了生命气象,给予革命者以生命的礼赞。让我们想到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我认为《牵风记》塑造了丰富的共产党人形象,是一部大作。

从艺术上说,《牵风记》寓意于象,“乱云飞渡仍从容”,既透露着浓烈的现实主义底色,又洋溢着浪漫主义气息。徐怀中创作《牵风记》,经历了三次否定。第一次发生于上世纪60年代,第二次发生于上世纪80年代,他创作《西线轶事》前后,“几次动笔又几次辍笔”,这一次的否定源于整个社会精神认知的促动,个人文学认知的变化,这个变化又是整个新时期文学认识深化的结果。徐怀中说,源自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作家开阔了视野,深化了文学认知。徐怀中写作《牵风记》过程中的文学思考和新时期文学探索同步发生,即是个人的深切体验,又有浓重的时代印记。第三次则发生于《牵风记》文本的完成过程中,是一个历史过程,我称之为否定之后的升华。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几乎穿越当代中国文学整个过程,是自己创作的经验总结,又应和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思想潮,映照着当代文学前进的轨迹,凝结着当代文学的珍贵经验。它是一个人类化文本,又是有着丰富内涵并颇具启示意义的文学文本。

傅逸尘:《牵风记》的叙事内核是对生命的自然之美的极力赞颂与张扬,是对幽微人性的思考与观照,尤其是将人放逐到自然本性之中,然后又赋予其初心与神性,安放肉体也安放灵魂。小说浓墨重彩书写的是战争背面的景致,是对悲剧美学的深入探索。残酷与血腥被浪漫情怀与审美目光所遮掩,人性的高洁与卑下,英雄与匪性、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多种自然色彩的交织与缠绕,彰显出战争背面的别样风情与生命暗影。

故事虽然并不复杂,矛盾冲突也谈不上多么激烈而跌宕,却写出了大河般宏阔辽远的感觉,显露出硕大丰沛的精神容量。除了执著而强烈

的文学自信,小说中颠覆传统伦理与文化价值观的旨意也是显而易见的。正是这种颠覆性的写作伦理和超越性的审美意向,使得中国当代军旅小说终于超越了底层叙事、世俗经验的藩篱,得以进入精神和灵魂叙事的存在之境。

在《牵风记》里,浪漫奇崛的想象、奇观化的历史场景、细腻入微的写实笔触,共同建构起一个“有情”的世界。战争是封闭的炼狱,徐怀中要在其中试炼人性,甚至是神性,最终指向的是超越意向。小说中的部分情节打破甚至颠覆了人们对战争的固有印象和认知。这种认知是超越日常经验、甚至超越世俗逻辑的。《牵风记》将知识分子的形象置于前景,处处凸显文化的力量。齐竞也好,汪可逾也好,他们除了军人的身份之外,骨子里知识分子的气质都是极浓重的。齐竞作为解放军指挥员,有着不同寻常的精英文化背景。汪可逾的职务是文化教员,这亦富含深意。这种人物形象设置将文化的魅力烘托到了极致,小说的精英底色、优雅气质由此铺展开来。

写实与写意、安然与或然、思辨与抒情,在《牵风记》中,现实主义与奇幻风格高度融合。小说一方面写得很虚,奇崛玄幻,深邃高蹈;另一方面写得又很实,亲身经验加之出色的记忆力,使得作者在复现和描写历史场景时游刃有余,绵密入微。在现实主义开始泛化,在故事超越形式与语言,在“底层叙事”苦难化的当下中国文学界,《牵风记》这样的唯美主义、“超验主义”与形而上思考,以及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书写,真的有如一股清新劲凜的春风拂面而过。

记 者:如果把《牵风记》放在新中国70年文学的漫长清单中,它应该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朱向前:《牵风记》自去年年底刊出以来,一直是出版界和评论界的热门话题,直至荣膺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可谓众望所归,实至名归。《牵风记》无疑是新中国70年长篇小说中的翘楚之作,是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高峰之作。同时,这也是一部“牵风”之作,它以区区13万字,不经意间就以四两拨千金地牵住了当代军旅文学的审美之风、探索之风、创新之风。

从沈从文、孙犁、汪曾祺到徐怀中,构成了中



国文学的独特一脉。特别是孙犁,他的冲淡、平和、纯净、阴柔、深情隽永之美,一直是徐怀中非常推崇热爱的。但是到了《牵风记》,徐怀中不仅深情、隽永、唯美,而且自铸新辞,雄浑博大,对前人既有继承更有超越。徐怀中少年参加八路军,经历过许多真实的战争场面,这些经历正是他的前半生中少有的,所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熔铸冶炼,他的笔愈加深沉老到,在平和、优雅、唯美同时,又有金戈铁马、风云跌宕的一面,有雄视天下、雄健豪迈、雄浑凝重的一面。虽然小说中工写细节如蕉叶上的蝉翼透如薄纱,但弥漫全书的写意式的战争风云却有如历史足音,步步紧逼,隆隆作响,撼人心旌。这一工一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张力场,并在其间激荡着一股苍茫、雄浑的生命气象。这在徐怀中乃至前輩的笔下都是鮮见的,这也就是说,徐怀中已经将沈从文、孙犁一路的小说美学风格作出了相当幅度的拓宽与推进。

李国平:徐怀中90岁高龄创作的《牵风记》,对个人来说,应该是晚期创作,这部作品孕育着诸多信息和启示,对当下的文学语境乃至新时代的文学创作,都将产生示范性的影响。《牵风记》堪称“现象级”的文本,蕴含着许多超越作品本身、超越军事文学的意义。小说融注了徐怀中一生的阅历,贯彻着创作者经过否定之否定、升华而获得的文学观念,呈现出对世界、对人的更深入的理解。这部作品是作家对文学创作规律通彻的觉醒,是个人的晚期创作,但又是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某种示范、某种开始。

傅逸尘:《牵风记》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叙事文本,是一种超越具体历史语境的新的建构和想象,是一种浪漫审美精神的张扬。这有点类似于书法运笔中的偏锋或侧锋,使得线条气象万千、瑰丽奇谲,作品也因此呈现出中正伟岸之外的别样韵致。这种战争叙事与文学风格在中外战争文学中都是不多见的,尤其在中国当代军旅文学中更是独树一帜,彰显了徐怀中先生几十年来对文学形式的先锋性探究、对生存和死亡的形而上思考、对战争和人性的终极追问。

中国当代战争小说鲜有浓墨重彩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优秀作品,《牵风记》对战争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对他们心理和灵魂的深刻解析,将文化、教养之于战争、军队、社会和人的意义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徐怀中先生呼唤并倾力建构战争文学中的审美存在,甚至不惜颠覆以往战争历史中的突然图景,就是为了敞开一个新的文学世界、印证一种新的叙事逻辑。他念兹在兹的正是文化的力量,是那种超越了战争,甚至超越了时空、直抵人心的审美的魅力。